

文化、资产与社会流动：《远大前程》财富观再批判

陈礼珍 李思兰

内容摘要：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通过形式结构凝聚起批判力量，对维多利亚社会流行的财富观做出道德阐释。皮普接受了绅士文化的感召，却未能用它来塑形自己的意念和行动。

《远大前程》围绕着财产赠予展开，但是这笔财富涉及道德正义的幻影和资产的原罪问题，表露出维多利亚人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跨越阶级和地域的上、下之路并非易事。通过对小说人物所持财富观的批判，狄更斯表达出他对英国文化价值体系里面工业精神衰落状况的深度思考。

关键词：《远大前程》；狄更斯；文化；财富；社会流动

作者简介：陈礼珍，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以及小说阐释与叙事理论研究；李思兰，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小说与文化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项目批号：12&ZD17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ulture, Property and Social Mobility: Critique of the Notion of Wealth in *Great Expectations*

Abstract: Dickens builds up the power of critique through the formation and structure of *Great Expectations*, making a mo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pular notion of wealth in Victorian society. Pip, with the gift from Magwitch, follows the trend of social mobility but fails to model himself as a gentleman. The gift, which enables him to climb to a higher stratum of the society, implicates the illusion of moral righteousness and the original sin of capital. The forging and melting of power reveals the hardship that one may encounter in the upward endeavor of social mobility. This novel exemplifies Dickens' reconsideration of and worry about the decline of industrial spirit in the value judgments of British culture.

Key words: *Great Expectations*; Dickens; culture; wealth; social mobility

Authors: **Chen Lizhen**,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tudy of fiction and narrative theory. Email: chenleezhen@163.com **Li Silan**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Her area of research includes British culture and novel. Email: lesley0451@sina.com

自英国小说在 18 世纪兴起以来，财富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①到了 19 世纪中期，财产仍然还是众多作家编制小说情节的重要手段。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黄金一代作家群体的旗手，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董贝父子》、《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和《我们共同的朋友》等作品中都对金钱崇拜进行过批判，而他对维多利亚人财富观的深度思考无疑最完整地呈现在《远大前程》之中。他在《远大前程》整体情节走向的多处重要节点将财富作为改变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财富的得失成为驱动人物命运发展的最大推力。如果将《远大前程》放在英国文学源流之中加以考察，可以发现这部小说其实并非奇崛突兀之作：在构造程式来说，它兼取了《哈姆雷特》、《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弗兰肯斯坦》之众长（Wilson 57-58）；就小说所描述的寒门子弟出人头地的理想及其幻灭的道德主题而言，前有司汤达《红与黑》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小说（1837—1843）的漫漫余音（Stange 10），后亦有萧伯纳戏剧《卖花女》（1913）遥远的回响（Goldberg 114）。

有意思的是，狄更斯《远大前程》的文学子嗣萧伯纳对小说主角皮普以及狄更斯本人都颇为不满。萧伯纳对皮普的财富观嗤之以鼻，将他称作趋炎附势的“寄生虫”（parasite），认为他欣然接受神秘恩主的资助去伦敦过起绅士生活的做法属于不劳而获。同时，萧伯纳还责怪狄更斯在小说中没有对皮普的价值取向加以批判，认为“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在于皮普和他的创造者（狄更斯）一样既没有文化也没有宗教信仰”（Shaw 49）。萧伯纳对皮普和狄更斯的批判极具洞察力，但是他的归因判断却似乎值得商榷。限于篇幅问题，本文不展开论述宗教缘由，只关注狄更斯的文化问题，聚焦于他在小说里面所表达的对维多利亚社会文化价值观和工业精神的思考。

审美趣味的阶级文化属性

作家身上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不仅涉及个体爱好和性情，在深层次上还反映出整个社会与阶级的审美意识形态。作家在写作中通过主题、话语、文体和叙事结构的选择来表达自己的审美趣味，而后者又体现出他们的文化身份与阶级归属。在这种理论的关照下，和许多批评家一样，萧伯纳将狄更斯在艺术上易受人攻击的弱点归因为“没有文化”。这种论调似乎有确凿的“史实”为依据：狄更斯出身于贫寒之家，自幼未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仅于 1824—1827 年间在威灵顿寄宿学校短暂求学，他虽然也读过一些“高雅”的文学经典，但更喜欢旅行知识、航海小说和自然历史（Bodenheimer 7-8）。这些属于通俗文化范畴的读物在 19 世纪的英国社会里显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文化资本。但是狄更斯具有天纵英才的想象力、语言能力和幽默感，而且懂得如何扬长避短。乔治·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对他的评论切中了问题的肯綮：狄更斯拥有“辉煌的想象力能量”，他的叙事抱负和写作特点是“绝不描绘理想式或英雄式的事物，中产阶级史诗的所有才智尽在掌握之中”（qtd. in Tjoa 81）。刘易斯所谓中产阶级史诗，指的是小说。狄更斯继承与发扬的并非贵族精英式的古典文化，而是小说这种伴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而迅速传播的流行文化。

《远大前程》的主人公皮普自幼父母双亡，由姐夫和姐姐乔氏夫妇带大。乔氏夫妇生活在乡间沼地，靠打铁为生，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底层成员。在这种境况下，对皮普来说，可以预见的将来就是在姐夫的铁匠铺里当学徒，等成年之后再自立门户成为铁匠，娶妻生子，过着养家糊口的劳苦生活。可是皮普心中时刻涌动的远大梦想是摆脱贫苦现状，成为

一个富裕而有派头的绅士。皮普生性敏感而且怀有逆反心理,年幼时他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知还处于混沌状态,由于出身关系,他对劳动阶层成员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但是对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中产阶级成员则抱有敌意,比如他对神职人员伍赛甫(25)^②、办夜校和开小店的伍赛甫姑奶奶(47)、以及粮商潘波趣等人都报以戏谑讥笑的语气(58-59)。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这些人是在帮他祷告、教他识字或者辅导他学习算术(27, 47, 73),但是皮普对这些村里和镇上做买卖的小资产阶级成员却极尽讽刺之能;与此同时,他对镇上富婆郝薇香和她的养女艾斯黛拉却天生充满好感,即便她们对自己加以白眼和侮辱。初次进入郝薇香小姐家的大宅,皮普就硬着头皮忍住了房子阴森的气氛和郝薇香古怪的仪表。在牌局中,艾斯黛拉“鄙夷地”数落皮普语言粗俗,“把‘奈夫’叫做‘杰克’”,而且叹息他“手有多粗糙”,“鞋有多笨重”(66)。艾斯黛拉自幼生活在富裕阶层,接受士绅阶层生活方式的教养,她对自己的阶层归属具有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因此听到穷小子皮普使用的语言,看到他的服饰和仪表之后产生鄙视感。按照皮普在此前叙述中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心理,此时他肯定会因强烈的自尊心而产生屈辱与愤怒,但奇怪的是,皮普对艾斯黛拉如此刺耳的话居然没有任何反感和驳斥意愿。相反,他竟然顺从地接受了艾斯黛拉的价值判断,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以前我从来也没想过自己的手有什么见不得人,可是这时候竟然也认为自己的手实在生得很不像话。她对我的污蔑可着实厉害,竟像有传染似的,于是连我也轻蔑起自己来了”(67)。这个看似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其实表征了皮普“做绅士”远大前程梦想的开始:他对自己低下的劳动阶层身份和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想要成为像艾斯黛拉那样的“上等人”。

“上等人”绅士品行的锻造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而是需要长期的教育和培养,即文化的熏陶。文化(culture)一词可追溯的最早词源是拉丁文 colere,最接近的拉丁文词源是 cultura,具有“栽种”和“照料”的意思,在16世纪和17世纪意义范畴才变得更加丰富,被隐喻为“人类发展的历程”以及心智的培养(威廉斯 101-02)。文化一词的内涵总是同阶级与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T·S·艾略特指出文化有三层含义,它关乎“个体、群体或阶级以及社会的发展”,“个体的文化依赖于群体或阶级的文化,而后者又依赖于它所在社会的文化”,因此在这三者之中,“发挥基础作用的是社会的文化”(Eliot 21)。在艾略特看来,社会总体文化对个体和群体(或阶级)的文化起决定作用。绅士文化无疑是一种群体文化,它和社会个体的自我教育和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对社会个体产生感召和塑形作用。

《远大前程》的主要叙述者是皮普,全书核心情节围绕着皮普获得神秘恩主的资助后如何在伦敦学习过绅士“上等人”生活的期盼及其幻灭而展开。这部小说共59个章节,基本上被平均分成三个部分。就地理空间而言,从头至尾经历了沼地——伦敦——沼地的循环。狄更斯准确地捕捉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结构和社会风气,通过皮普的人生轨迹再现了社会流动模式的两大主要维度:在地理空间里从农村去往城镇和都市的水平流动,在社会空间里从中下层的贫寒之家跻身上层社会做绅士“上等人”的垂直流动。这两大流动趋势体现了社会个体提升自身地位的诉求,它契合了英国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同时它又体现出资产阶级力量强势崛起给英国社会其它阶层带来的巨大虹吸效应。

绅士文化身份的多重社会效应

在英国历史上，绅士文化的锻造总是围绕着内修智性德行和外修优雅举止这两个基点展开。《远大前程》众多人物时刻将“绅士”挂在嘴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只看到绅士的外在做派，却不理解绅士的真正内涵。“绅士”最早和“贵族”一样是由血统决定的，绅士文化一直和贵族阶层所秉持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有关，崇尚勇敢、忠诚和美德等品格，被贵族阶层男性奉为规范自身言行的重要准则。18世纪以来，道德力量被赋予越发重要的角色，和资本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绅士”的含义逐渐发生演变。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阶层的没落，英国社会的流动性得到进一步增强，绅士观念摆脱了以前的门第局限，成了日常生活中人称指涉的常用词汇，以表述其为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克里斯汀·博贝里希追溯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同版本之间对“绅士”一词的释义，从词源学角度指出它如何客观明了地反映“绅士”观念在19世纪的变迁：1815年第5版里它专指贵族阶层，1845年第7版中放宽到自耕农以上阶层，1856年第8版就加上了“此称呼亦常被用于普通商贩以上人群，只要他们的行为带有一定的优雅（refinement）和智性（intelligence）”（Berberich 9）。可以看出，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绅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而是指具有一定经济地位，愿意而且能够恪守优雅和智性风度的人群。

要想成为绅士，得要接受精英模式的自由人文教育传统熏陶，并奉行克制自己和尊重他人的价值取向标准。《远大前程》的皮普出身低微，没有这样的机遇。他在村里上夜校，仅仅是扫盲，学会识字，接受神秘的财产赠予到了伦敦之后，他去私塾教师朴凯特先生那里求学。从皮普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学到多少锻造绅士品格的素养，相反他在心底有些瞧不起朴凯特先生，对贵族出身的同学蛛穆尔也极尽讥讽。前文已然提及，皮普在绅士问题的价值取向上有个致命的矛盾：他一心想要成为绅士，却对绅士阶层大加讽刺。由此可见，皮普其实并没有在绅士阶层所秉持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里面找到归属感，他看中的是这个阶层在社会上优越光鲜的身份和地位。无论是皮普还是他的恩主马格韦契，他们所注重的都只是绅士外在仪态的高雅做派，并没有真正躬行绅士的内在品格。

皮普获得财产赠予之后到伦敦生活，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升自我形象，尽量将自己包装成绅士，如改换衣食样式、模仿措辞用语、注重举止仪态、雇佣仆人、拜师提升学识，诸如此类（193-223）。所有这些举措都得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财富可以提升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同时，要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也需要消耗财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个体的身份地位和阶级文化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想做绅士，就得实践绅士的生活方式。在维多利亚社会金钱崇拜风气熏陶下，在一些普通民众眼中，“绅士”一词已经丧失了原本的男性气概和诚实品质等丰富鲜活的正能量，蜕化成“有钱人”的同义词，单向度地被视为物质财富的拥有者和消费者。因此，律师贾格斯刚刚将神秘恩主巨额财富赠予的消息告知皮普，贾格斯和乔等一些立刻就将皮普视为“绅士”（158-59），在他们看来，有钱了自然而然就可以成为绅士。“做绅士”已经成为维多利亚社会阶层流动历史潮流中的宏大旋律，它对社会个体成员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指引他们的信念和行动。人们以跟风绅士阶层的消费方式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对这个阶层的身份认同。

19世纪中期，绅士文化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中下阶层成员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他们趋之若鹜，《远大前程》对这种情形进行了生动描述。绅士文化当然具有历史

必然性,也有众多优点;同时,它无疑也给英国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狄更斯在一些谋篇布局的细节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马格韦契发财致富以后全身心投入打造绅士的事业,对开办工厂或者商贸事业毫无兴趣;皮普获得财富资助以后过上绅士生活,生活浑浑噩噩,毫无事业心与进取精神;郝薇香小姐祖上办酿酒厂起家,发财致富以后便过上了悠闲的士绅阶层生活,酒坊也被荒废,建了一所大宅叫“有余庄屋”,意思是“谁有了这座宅子,谁就会心满意足,再没有别的要求了”(59-61)。小说主要人物生活中关心的都是如何消费财富,以使自己具有绅士做派,根本无心再去从办实业或者进行商贸活动,对工业价值观产生隔阂和抑制。这种消费和生产脱节的文化价值取向必然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产生的显著结果是使得英国的“经济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具有活力,政治体制不那么支持经济的发展”(威纳 12)。

《远大前程》于1860年12月至1861年8月之间连载于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四季》,此时英国已经进入相对平静的历史时期,此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似乎盛世已经降临到英国,因此该时期被冠以“均衡时代”(the age of equipoise)或者“维多利亚正午”(Victorian noon)之名(Feltes 18)。这种太平盛世的景象下,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愈发疯狂,“整个社会都沉湎于出人头地,这个时代过度地将物质成功等同于救赎”(Meckier 537)。从维多利亚时代前期到中后期,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莫里斯所形成的文脉对英国社会工业价值观和机械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文化的流变。整体来看,从卡莱尔的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到阿诺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再逐渐演变成罗斯金的幸福康乐与精神和谐,最后再是莫里斯的愉快劳动和审美享受(殷企平 32, 91, 163, 202)。这条英国文化的流变脉络走向有着积极意义,批评界已经给予它充分肯定。在狄更斯写作与发表《远大前程》的前后不久,罗斯金在《康希尔》(Cornhill)杂志连载发表或者讲演的《给这后来》(1860)、《报以尘埃》(1862—1863)以及《芝麻与百合》(1864)等作品中对财富和幸福的意义进行新的阐释和定义。罗斯金的众多论述“使竞争变得声名狼藉而广为人知。他也使生产失去了内在的道德价值,虽然这方面较少为人知”(威纳 53)。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一起引导了英国社会文化从卡莱尔注重生产实践的“工作福音”向他们注重精神审美的“艺术福音”的流变,他们试图从知识话语和词语系谱角度对财富一词进行重构,赋予其新的意义,将财富与成功引向生活、生命和心灵。^③罗斯金和卡莱尔、阿诺德以及莫里斯如出一辙,在反思进步时无形之中基本都在对工业价值观进行消解。

这样的文化嬗变毋庸置疑地对工商业精神造成极大的压制作用。与这个文化流变脉络走向同步的,是绅士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乡绅情结。富裕阶层一般都会在乡下置办房产,过上悠闲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对投资实业与商贸的热情逐渐消退,使得英国社会的工商业精神缓慢衰落。狄更斯对工业和商贸事业的态度并不是单纯地否定与批判,他同样肯定工商业精神和价值观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实是,他曾在1850—1851年间担任“艺术学会”副主席,参加1851年伦敦首届世博会的筹备工作,并为“世博会基金”募捐(Philpotts 202-03)。学界一般认为,正是在世博会举办前后这段历史时期,随着水晶宫的建造以及琳琅满目工业产品的展出,工业价值观以及对技术与商品的崇拜在英国达到全盛时期。在此之后,工业精神在英国便逐渐衰落。

与之相应的是,狄更斯也是在这段时期里逐渐褪去年轻时代的乐观精神,变得悲观而

冷毅，对工业制度、技术进步和财富创造的情感也复杂起来。狄更斯以自己的文学虚构叙事参与到维多利亚社会文化流变的思考与塑形之中。他在诸多作品中对金钱崇拜和无道德节制的野心进行批判，但是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做简单化处理，而是在不同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与立场。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确实“把他最痛恨的一切东西都与工业制度联系起来”，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也描绘出商业阶级的痛苦，从而使“追求财富受到谴责”，但是他的社会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像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地“摒弃靠自己力量成功的人，转而肯定乡绅理想，这种乡绅理想剔除了阶级和社会的野心”（威纳 46-47）。如果对狄更斯的生活经历进行考证的话，狄更斯本人无疑是认同乡绅文化价值观的，因为就在写作《远大前程》之际，他重新装修了在肯特郡海厄姆村置办的乡间宅邸，在那过起了乡绅样式的生活（Dickens, *The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 126, 167）。然而狄更斯并未将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带入写作之中，他在《远大前程》中没有美化乡绅生活方式；同时，他也没有否定人们追求财富和提升社会地位的渴望，而是将财富和自食其力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新的语意。他在《远大前程》中捕捉了英国社会文化流变中的新动向，而且用道德寓言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狄更斯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作家，在创作《远大前程》时，他也在编辑《一年四季》杂志，同时还在商讨计划进行巡回朗诵会等多项活动（Kitton 305-06）。狄更斯本人对工商业并不排斥，这从 1860 年 5 月 3 日写给法国友人德赛贾（M. de Cerjat）介绍家人近况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狄更斯在此信中提到他的 6 个儿子，首先重点介绍的是做生意的长子和老三：长子查理他“已在巴林银行工作了三四年，马上要去香港做茶生意”，“以后准备去伦敦自己开商号”，“我把他弟弟弗兰克从法国和德国那边叫回来学做贸易，只等他兄长从天朝（Celestial Empire）回来就和他搭伙”（Dickens, *The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 134）。由此可见狄更斯对商贸事业寄予厚望，或许是这些因素促使他将《远大前程》中踏实劳动的乔、文米克与赫伯特三人刻画成生活中的成功者，而且在小说结尾处让远大前程梦碎之后的皮普自谋生路，过上平稳日子。赫伯特是全书正能量最多的人物，出场时他被皮普称为“白面少年绅士”（99），他的人生规划明确，工作“兢兢业业，勤勉有加”（541），最终获得事业成功和爱情幸福，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励志人生故事。1861 年 5 月 22 日，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已经写到后半部分，他邀请了几个朋友陪同家人从伦敦城东坐船到城南，为小说场景描写寻找素材。玛格丽特·卡德威尔（Margaret Cardwell）发现在那天之后，狄更斯对小说做了一个较大变动：修改了赫伯特的外貌和家庭背景，“为了使他有几分像自己的长子查理”（qtd. in Schlicke 260）。可见狄更斯对中产阶级绅士阶层代表赫伯特人物形象的处理与情感寄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对绅士文化进行深度思考，批判人们对绅士“上等人”生活方式的媚俗心理，让他们的梦想全部破灭。《远大前程》并没有通过小说的虚构叙事来强化有钱就可以当绅士这个理念，否则它就无法体现出应有的批判价值，也就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道德寓言。为了规避这个道德陷阱，狄更斯还特意在小说开头处就设计了一个情节机关：皮普的远大前程来源于一笔巨额的财富赠予，而这笔财富赠予又是缘起于当年他帮助了罪犯马格韦契进行越狱。

远大前程的道德幻影：资产与原罪

《远大前程》围绕着主人公皮普做“上等人”绅士理想的失败而展开。这个理想建立在一个由资产构筑的道德幻影之上，因此越发显得虚幻而岌岌可危。皮普的“远大前程”起源于他幼年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帮助罪犯马格韦契逃离追捕（结果并未成功）。虽然皮普当时年纪尚小，无需承担刑事或者民事责任，但他心里其实已经隐隐察觉到帮助马格韦契越狱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此时的马格韦契犯了重罪被判刑14年，至于原因，马格韦契自己在第42章中有所提及：“犯了重罪，罪名是盗窃货币投入市场，另外还有好几款罪名”（392）。马格韦契从小就是一个惯犯，所犯罪行罄竹难书。马格韦契将入狱原因归结于法官歧视他没有文化以及主犯康佩生检举揭发他，他在谈到法庭的宣判场景时，居然将自己描绘成阶级歧视的受害者（392-94）。实际上，小说文本清楚地表明，不管他如何替自己辩解，他的犯罪事实都很清楚，证据确凿，应该得到法律惩罚。

马格韦契越狱时恐吓皮普为自己提供帮助。皮普拿锉刀和食物救助了一个“人”，但这个人却是个逃犯，而且在那时他并没有受到急危的生命威胁。因此就道德层面来说，皮普的救助行为称不上善行。皮普那时还小，属于无责任能力年龄阶段，对于自己偷锉刀和食物给犯人一事，他感到良心受到谴责，有很深的愧疚感，但是他担心的并不是放跑了犯人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而是担心自己偷了家中的食物，迟早会被姐姐发现而惩罚自己。后来当他知道偷窃一事已经蒙混过关时，他顿感轻松，认为“我总觉得，我的动机总还有几分是出于善行吧”（44）。《远大前程》采取的是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呈现出幼年皮普在法律和道德层面懵懂无知的状况，幼年的皮普一直以“同情心”和“善心”这种超越法律界限的道德幻影来麻醉自己，在伦理价值取向上存在混乱。等到小说进行到后半部分，皮普已经成年，当马格韦契上门来找皮普时，皮普的心智已然成熟，他对马格韦契的犯人身份非常敏感，言语中急着和他划清界限，说他俩“毕竟走的是两条路”（355）。当他知道那个神秘恩主居然是马格韦契时，他“定下心来，仔细一想，才完全明白我搭乘的这条命运之船已经触礁撞毁，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363）。皮普在这个瞬间明白了那笔财富赠予来源于这个犯罪分子在流放澳大利亚期间所赚得的财富，自己的远大前程从一开始就都带着原罪，这种致命的丑闻会让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

《远大前程》男主角皮普的人生观和财富观有失偏颇，他的“远大前程”是一段不劳而获就可以出人头的故事，这种情形实在侥幸，除了情节上的猎奇，或许对维多利亚时代读者提供不了多少借鉴意义。狄更斯当然不会让故事结局滑往这个方向。他在细节设置上非常巧妙，环环相扣地产生一个无解的道德死角。皮普所收到的财富赠予以及随之而来的远大前程都是构筑在幼年时救助逃犯这件事情之上，而这件事情并没有牢固的法律和道德根基。所谓皮普的“善行”以及马格韦契的“知恩图报”只是懵懂小子和犯罪分子各自心中的道德错觉罢了。对于这个问题，狄更斯本人是心知肚明的。在谈及《远大前程》时，狄更斯对乔治·刘易斯等人说他“对怪诞（grotesque）有着细腻的情绪感知”之类的评语甚为受用，自认为罪犯马格韦契赠予财富给皮普这个穷小子的情节设置真是一个“既新奇又怪诞的好主意”（Hollington 264）。狄更斯和刘易斯等人所说的怪诞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笼罩着这笔财富赠予的罪恶阴翳。构筑在这种道德幻影之上的远大前程，注定终将烟消云散。

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编制出精细的情节线条，使之环环相扣，迂回曲折。皮普远大前程的幻灭这则道德寓言的批判性内核直指这个远大前程缘起时就带有的原罪。关于这点，狄更斯在谋篇布局中处处埋有伏笔。小说结尾处，马格韦契潜逃回国的事情遭人揭发并判处绞刑，财产悉数被没收，皮普大病了一场之后再次回到故乡，变卖家当，偿还部分债务后去海外谋生，此时他对人生命运的无常深有感慨。狄更斯在情节安排上似乎刻意打上了因果循环和宿命论的烙印，让皮普希寄望于依赖别人财产赠予而出人头地的“远大前程”泡沫最终消散，形成了一则与机缘、财富和人生有关的道德寓言。然而狄更斯最终还是给了皮普自我救赎的机会，在小说结尾处用他叙事报道的形式快节奏地讲述皮普在梦想破灭后如何外出经商，踏实工作，最终获得财富与成功。

狄更斯在 1861 年 6 月 26 日致威尔基·柯林斯的信中提到，自己原本为《远大前程》设计了更加凄凉灰暗的结局，但最终接受了布尔沃·里顿（Edward Bulwer-Lytton）的建议，在结尾处让皮普在海外经商致富后回到故乡，全书最后一行文字还暗示皮普和艾斯黛拉二人阅尽人间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一起（Dickens,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 to Wilkie Collins* 101）。这是狄更斯作为流行文学写手的明智之处，他熟谙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价值取向，懂得在文学消费时代人们追求的是道德和精神上的双重慰藉。《远大前程》表现了狄更斯严肃的道德感，他通过这则道德寓言向维多利亚人，尤其是青年读者，传递了关于财富观的正能量。

将《远大前程》放置在英国 19 世纪后半期的文化转型语境中，我们可以发现狄更斯对工业精神、绅士文化、劳动以及财富的焦虑和辩证看法。狄更斯通过对小说人物所持财富观的批判表达出自己对英国文化价值体系里面工业精神衰落状况的深度思考。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不是通过直白的语言内容，而是通过形式结构凝聚起了批判力量，揭示出依靠财富赠予而得来的成功是巨大而斑斓的泡沫，终将破灭，而自食其力和投身工作虽然不一定大富大贵却能获得稳固的幸福。乡下穷小子皮普变身伦敦绅士，最终前程泯灭，又黯然回到乡下，这样的结局表明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跨越阶级和地域的上行之路并非易事，完全由别人提携的成功毕竟难以持久，唯有自己亲手创造的前程才会坚实而远大。泡沫破灭之日就是人生真正幸福的开始酝酿之时。狄更斯或许在为他那个时代描绘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文化愿景：踏实工作造就幸福人生。

注解【Notes】

①本文的“财富”一词限定于讨论它的通俗用法，指具有经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品，而不涉及幸福康乐和道德精神等层面。

②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狄更斯：《远大前程》，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文字个别地方略有改动，以下只标出页码，不再另行做注。

③关于“财富”观念在 19 世纪中期的演变与多重阐释以及罗斯金对财富意义的重构，参见乔修峰：“原富：罗斯金的词语系谱学”，《外国文学评论》4（2014）：80-9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erberich, Christine. *The Image of the English Gentleman 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Englishness and Nostalgia*.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 Bodenheimer, Rosemarie. *Knowing Dickens*. Ithaca: Cornell UP, 2007.
- Dickens, Charles. *The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 Vol. 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79.
- .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 to Wilkie Collins*. Ed. Laurence Hutt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92.
- Eliot, T. S.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rber and Farber Limited, 1948.
- Feltes, N. N. *Modes of Production of Victorian Novels*.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86.
- Goldberg, Michael. "Shaw's *Pygmalion*: The Reworking of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haw Review* 3 (1979): 114-22.
- Hollington, Michael. "Grotesque."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 Ed. Paul Schlicke. Oxford: Oxford UP, 1999. 264-65.
- Kitton, Frederic George. *Charles Dickens: His Life, Writings and Personality*. London: T. C. & E. C. Jack, 1902.
- Meckier, Jerome. "'Great Expectations' and 'Self-Help': Dickens Frowns on Smiles."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4 (2001): 537-54.
- Philpotts, Trey. "Dickens and Technology." *A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 Ed. David Paroissie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199-215.
- Schlicke, Paul. "Great Expectation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 Ed. Paul Schlicke. Oxford: Oxford UP, 1999. 259-64.
- Shaw, George Bernard. "George Bernard Shaw on the Unamiable Estella and Pip as Function of Class Snobbery." *Charles Dickens's Great Expectations*. Ed. Harold Bloom.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47-50.
- Stange, G. Robert. "Expectations Well Lost: Dickens' Fable for His Time." *College English* 1 (1954): 9-17.
- Tjoa, Hock Guan. *George Henry Lewes: A Victorian Mi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77.
- 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王章辉 吴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 [Wiener, Martin.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Trans. Wang Zhanghui and Wu Bikang. Beijing: Peking UP, 2013.]
-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
- [Williams, Raymond. *Key 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 Liu Jianji.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Wilson, William A. "The Magic Circle of Genius: Dickens' Translations of Shakespearean Drama in *Great Expectations*."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2 (1985): 154-74.
- 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 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
- [Yin Qiping. "An Apologia of Cultur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责任编辑:王树福